

刘祥学 著

明朝民族政策演变史

民族出版社

MINGCHAO
MINZUZHENGCE
YANBIANSHI



刘祥学 著



明朝民族政策演变史

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 青

责任校对:郝杰、许英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朝民族政策演变史/刘祥学著. -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6
(博士苑丛书)

ISBN 7-105-07768-9

I. 明... II. 刘... III. 民族政策-研究-中国-明代
IV. D69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2935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金若龙公司微机照排 北京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5.5 字数:42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定价:34.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序 言

我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从秦汉起更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屹立于世界。因此，历代王朝民族政策的研究，也就成为中国政治史和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明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阶段，明朝民族政策的研究，自然也应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直到改革开放以前，历代王朝包括明朝民族政策的研究始终是个薄弱的环节，有的还是空白点。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研究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相关的学术成果相继涌现。不过，相对而言，明朝民族政策的研究还是显得比较薄弱，而且主要集中于明前期和明后期，特别是明蒙关系、明与女真（满族）关系以及西南土司制度的研究。

刘祥学同志在大学就读本科时，选修了我讲授的《明史》课，对明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89年本科毕业后，考取硕士研究生，跟我学习明史和明代民族关系史。针对明朝民族政策研究薄弱，他本人又是少数民族的情况，我让他专攻明朝的民族政策，并以《明正统至天顺年间的民族政策》作为硕士论文的题目。他按期完成了论文的写作，经答辩通过，获得硕士学位。此后，刘祥学同志到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一直坚持明朝民族政策的研究，相继发表了一批有关明中期民族政策的论文，然后将研究范围向前后拓展，写出这部学术专著——《明朝民族政策演变史》。

刘祥学同志的这部著作，按照朝代的顺序，结合当时全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逐个阶段分析明朝的民族政策及其成败得失，使明朝近三百年民族政策发展演变的脉络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明朝民族政策演变历史的专著，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细读全书，人们可以发现，它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实事求是地评价明朝民族政策，肯定其当肯定者，否定其当否定者。由于受到清代以来种种灰暗明史观和西方中国历史“停滞论”的影响，以往史学界对明史的评价一般都不高，不仅远逊于汉唐，而且也不如元清。受到这个总体评论的制约，对明朝民族政策的评价一般也都较低，有的甚至持否定的态度。其实，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明朝是唐朝以后又一个国祚绵长的王朝，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有突出的成就，农业和手工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繁荣、白银的货币化、南北两京的营建、长城的修缮、大运河的治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太平洋航线的接通、教育科举的发展、社会风气的嬗变、思想领域的活跃、小说戏曲的兴盛、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综观中国的历史，任何王朝都只有比较妥当地处理民族问题，才有可能稳定其政治局势，发展其经济文化。秦汉如此，隋唐也不例外。明朝经济、文化领域各种成就的取得，因素很多，其中就包括明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与融合，而这又应归功于明朝处理民族问题的某些政策的成效。明朝的民族政策虽然本质上仍是一种民族歧视与压迫的政策，但同前后两朝即元、清的民族政策相比，还是比较开明的。元朝实现全国统一后，将境内的各个民族按被征服的先后划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个等级，公开实行歧视与压迫汉人与南人的政策。清入关统一全国后，不仅实行与之相似的划分满洲、蒙

古、汉军、汉人四个等级的民族政策，不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蒙古、汉军、汉人和其他族人，而且公然推行薙发令，用屠刀强迫广大汉人薙发易服，改从满洲的风俗习惯。明朝建立后，不仅抛弃划分民族等级的做法，公开申明对各个民族要坚持“华夷一家”、“一视同仁”的态度，而且对各个少数民族实行“因俗而治”的政策，保留少数民族原有的政治制度、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变。孰优孰劣，泾渭判然。刘祥学同志搜集丰富的史料，在书中详细论述了明朝民族政策演变的全过程，实事求是地指出明前期和中后期的民族政策都有其正确与失误之处，就总体而言，“明初之时，民族政策失误较少，而明中期以后，失误频频，以致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最终在周边民族的反抗下，趋于衰亡”。

第二，注重明朝民族政策的动态研究。由于清代官方修撰的《明史》各篇志书未能清楚地论述明朝政治、军事、经济、科举等各项制度的变化影响，人们长期习惯于将明朝的典章制度甚至社会生活、风俗习惯都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有些研究明朝政策的论著，列举明朝民族政策及统治制度的方方面面，而未能说明其在明前期与中后期的发展变化。其实，在明朝统治的近三百年间，社会处于激烈的变化之中，其统治政策也在不断地调整变动。作者敏锐地察觉到这个问题，他以《明朝民族政策演变史》作为书名，将明朝的历史划分为若干阶段，然后逐一评述其民族政策及实施效果，指出哪些政策获得成功，哪些政策遭到失败，从而揭示出明朝民族政策发展演变的轨迹及其经验教训。这不仅有助于人们掌握明朝民族政策前后变化的概貌，也有助于人们加深对明朝盛衰历史的理解。

第三，创见迭出。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如果所发表的学术论著，只是一味地重复或综述前人的成果，没有自己的创见，就无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可言，学术研究就会停滞不前。刘祥学同志

这部专著，不仅广泛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且融入自己的研究心得，对明朝民族政策的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如正统年间王振三征麓川，过去曾得到某些学者的肯定。作者没有随声附和，而认为它是王振专权后，“一切以巩固权势，提高个人声威为基本出发点，随意调整明前期制定的民族政策”之举措，王振不顾北方势力正盛的瓦剌对明朝的威胁，倾全力征剿麓川，在麓川宣慰使思任发逃往缅甸，其子思机发多次遣使入朝谢罪之后，仍不肯罢兵，结果不仅使明朝损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加重东南各省百姓的负担，而且从北线抽调武将南征，削弱北方的防御力量，给予瓦剌以扩展势力的机会，从而埋下了日后“土木之变”的祸根。这种见解，显然更符合历史事实，也更具说服力。又如作者关于明朝民族政策的两个基本轴心及其关联性和差异性的论述，也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此外，书中总结明朝民族政策成败的经验教训，指出“正确的民族政策是明朝得以巩固壮大的基本前提之一”，“退缩防御未必就能‘守成’”，“民族政策一旦成为少数人的谋利工具就必然会偏离正确的轨道”，“强大的武备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实保障，但武力并不能解决复杂的民族问题”，“并不是所有的招抚政策都起积极作用”，无不给人以有益的启迪。

当然，作为一部全面、系统论述明朝民族政策演变历史的专著，本书也还存在某些未尽完善之处。如对明前期民族政策的分析、评述，写得比较从容、详细，而对明末民族政策的分析，就写得过于匆促、简单。又如对明朝民族政策成败得失的评价，大多从政治角度着眼，看它是否有利于明朝的巩固壮大，而较少从经济、文化的角度考虑，看它对促进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究竟起到什么作用。这些都有待于将来的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目前，刘祥学同志正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祝愿他学有

序 言

所成，将来能开辟一片更加广阔的学术天地，贡献出新的研究成果。

陈梧桐

2005 年 11 月 1 日于北京

内容提要

明朝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阶段，境内各民族不同程度的发展、壮大，也给了统治者不小的压力，迫使明朝统治者正视民族问题。为了处理好民族问题，稳定对周边民族地区的统治，明朝统治者制定了内容十分丰富的民族政策。但由于受明朝国力强弱变化、当政者个性以及政治斗争等诸多因素的干扰，明朝民族政策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演变，给明朝国力造成了巨大影响。可以说，明朝的兴衰都与民族及民族政策的成败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从明朝民族政策的演变去探讨明朝的兴亡问题，以揭示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本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明朝民族政策的内容、不同时期的演变以及演变的原因、产生的后果，并客观地加以评价。

全书共分九章：

第一章，明朝的民族观与民族事务管理机构。主要叙述明朝民族观的内容及对民族政策的影响；明朝有哪些民族事务管理机构及它们的运作方式；明朝法律中体现民族观与民族政策的一些有关少数民族的法律规定。

第二章，明朝民族政策的基本内容及影响民族政策的几种因素。主要从总的方面归纳总结明朝民族政策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宗教和军事等方面的内容，并探讨促使其演变的诸多因素。

第三章，明初洪武、永乐创业时期开拓进取的民族政策。论述明太祖、明成祖时期，对周边民族的民族政策，突出其开拓进取、草创奠基的时代特征。

第四章，洪熙、宣德守成时期民族政策的调整。主要论述明仁宗宣宗时期明朝民族政策的调整的原因和过程，突出其守成的时代特征。

第五章，正统、景泰转折时期明朝民族政策的再次调整。论述明英宗、明景帝在位时期的民族政策的发展演变情况，突出明朝开始走向衰落的时代特征。

第六章，天顺至正德缓慢衰落时期的民族政策。主要论述明英宗复辟后至明武宗在位时期的民族政策，强调这一时期民族政策演变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

第七章，嘉靖至万历间内忧外患交织时期的民族政策。从统治日趋腐朽造成的内忧和军备废弛造成的边患交织，对明朝民族政策演变所产生的影响出发，详细地论述这一时期民族政策的演变的主要标志和过程。

第八章，天启、崇祯间国势不可收拾时期的民族政策。主要从明末腐朽统治所造成的重重矛盾出发，探讨明朝民族政策的演变，对明朝衰亡的影响。

第九章，关于明朝民族政策演变的评价。主要从总体上分析明朝民族政策的成败得失问题，总结其兴亡的经验教训，归纳其演变的基本规律。

前 言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与汉族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相生相伴，彼此间既相互竞争，又往来密切，不断融合，最终形成了一个复杂而有生机的中华民族有机整体。不论任何朝代，谁也不能将少数民族从中华民族肌体中剥离开来。虽然少数民族人口较少，经济文化也不及汉族发达，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只能充当历史的配角。历史上，少数民族或为反抗封建剥削，或为打破经济封锁，或为争夺中原统治权，都曾给当朝统治者以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正视民族问题。任何王朝的统治者，如要想使统治得到长久安稳，都必须认真处理民族问题，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如果在民族问题上失策，统治注定不会得到安宁。一些封建王朝就是在民族反抗的风暴中，不断衰落，走向灭亡的。

明朝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阶段。有明一代，我国境内已出现几十个民族的族称，每个民族的聚居区与分布地都比较稳定，各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已基本定型，与今日各民族已基本一致了。^① 与前代相比，各民族人口也有不同程度增加，尤其是边疆地区，少数民族

^① 参阅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58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人口占较高比重。如长城以北的草原地带，是蒙古族的聚居地，嘉靖时号称部落众多，人口繁庶；又如岭南地区，民族较多，史称“夷凡十数种，杂处郡县山野间”，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超过了汉族。《明史》称“广西徭、僮居多”，《明实录》则称广西“大率狼人半之，徭僮三之，居民二之”^①。壮族人口已明显跃居各族首位，“诸夷惟僮最众”，“生齿最繁”^②。西南地区的傣、彝、白、苗等族人口也有不少。李思聪《百夷传》载地处云南南部一带的麓川、平缅等处宣慰司，“其官属有叻孟、昭录、昭纲之类”，其中叻孟所领军民“多者总十数万人，少者不下数万；昭录亦万余人”^③。更重要的是，明朝通过积极的开拓，在广大边疆民族地区建立了一整套统治制度，实行了有效的统治。如在东北，明初设置的卫所，“星分旗布，塞卫据险，且守且耕，东逾鸭绿而控朝鲜，西接山海而拱京畿，南跨溟、渤而连青冀，北越辽河而亘沙漠”^④，而在吉列迷、女真等民族聚居区设奴儿干都司，统辖数百个羁縻卫所。在西北则设置有罕东、哈密等卫，在西南则推行土司制度，并逐步实行改土归流，统治不断加强。在西藏则利用藏传佛教作工具，通过多封众建，建立僧官制度；贡赐、互市等政治经济手段，维持着对西藏地区的有效管理与统治。在明朝统治的二百七十多年里，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的巩固和发展，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都极为频繁，民族间的融合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有所发展。很难想象，向来被人们视为腐朽的明王朝，何以能取得这样的业绩？其实要探讨这个问题，首先应该从其民族政策开始。

①（明）魏潜：《西事珥》卷五，《夷风记略》；《明史》卷三一七，《广西土司一》；《明世宗实录》卷三一二，嘉靖二十五年六月丙戌。

②（明）魏潜：《西事珥》卷三，《诸夷纂学》；卷五，《夷风记略》。

③（明景泰）陈文纂修：《云南图经志书》卷一〇，《百夷传》。

④（清）顾炎武：《肇域志·辽东都指挥使司》。

以往史学界根据对明朝的表面印象，就简单地对明朝民族政策给予较低的评价，认为明朝民族政策是失败的，不开明的，有的学者甚至还持否定的态度。不可否认，明朝的民族政策是有不少局限性，但如果毫无可取之处，又如何解释明朝的许多民族政策，如改土归流、因俗而治、利用宗教作统治工具、“以夷制夷”、发展民族地区教育文化等政策，为何会为清朝统治者所借鉴和继承，并继续推动了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壮大和发展。^①实际上，明朝的民族政策吸取了元朝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经验教训，又在元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使之更趋完善。如明代在南方广大地区因袭元代的土司制度，随后即根据形势需要开展渐进式的改土归流；与土司制度并行的是迁移大量的汉族人口，在西南民族地区推行屯田，打破了西南民族地区的闭塞状况，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进步和民族间的融合。这当中的许多宝贵经验教训又为清朝所吸取，因而明朝民族政策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特征。漠视这个特征，对明朝民族政策的局限性采取放大，对其进步性、开明性采取缩小的做法，是不能正确认识明代民族关系发展演变的规律的。

受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统治者个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明朝的民族政策始终处于不断调整、演变之中。在此过程中，既有一些错误的民族政策得到纠正，也有一些原本正确的民族政策偏离轨道，而产生新的差错。民族政策的每次调整演变，都对明朝自身的统治安危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些影响在当时并不是立即显现出来，而要经过一定时期后方才充分暴露。由于明代中期后，明朝的国力不断衰退，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失误较多，后果也较严重，因而从明代中期开始即有很多人物，如史学家高岱、

^① 参阅陈梧桐：《论明王朝的民族观与民族政策》，载《明史研究》第4辑，合肥，黄山书社，1994。

严从简、支大伦、魏濬、郑晓等从各种角度对明朝各个时期的民族政策的成败得失进行总结，大胆抒发其对时政的看法，许多议论，发人深省。正德以后，随着边疆少数民族与明朝统治者的矛盾不断加深，出于研究边情，总结民族政策的考虑，不少明人终生致力于研究“外夷”，谈论边防。因而有学者明言，明代记载少数民族的书特多，专门谈论边防的图说尤多。仅明嘉靖间就有许伦的《九边图说》、魏焕的《皇明九边考》、申用懋的《九边图论》、郑晓的《九边图志》、王士琦的《三云筹俎考》、张翰的《松窗梦语》、程开祐的《筹辽硕画》、田汝成的《炎徼纪闻》和《九边志》、杨时宁的《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等多种。^①另外一些当政人物如李贤、丘濬、王琼、杨一清、翁万达、高拱、张居正等都对当朝或前朝的民族政策进行了反思和总结。然而，由于受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们不可能全面正确地看待民族问题，他们虽然认识到民族政策产生失误的原因，却又受政治、经济、军事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无法彻底纠正这些错误。因而这些总结与反省，大多停留在思想层面，难以转化为具体的措施，自然效果也就有限。入清后，为明修史蔚然成风，一些重要的学者如顾炎武、谈迁、谷应泰、彭孙贻、赵翼等，在编撰明代史书时，多采用评、辨结合的方式，引用不少时人的见解，对明代治政得失加以总结评价，其中不少内容涉及民族政策的得失问题。不过，这些总结评价，多为就事论事的性质，并不涉及明朝民族政策的调整演变方面。

20世纪以来，海内外的明史研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的《中国近八十

^① 参阅萧槩：《中国历代的地理学和要籍》23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注中还引王庸：《中国地理图籍丛考》甲编《明代北方边防图籍录》所收录的北方边防图说达220种之多。

年明史论著目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李小林等编的《明史研究备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以及南炳文著《辉煌、曲折与启示——20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已有充分的体现。但是应当承认,与其他领域的研究相比,明代民族政策的研究在明史研究领域里仍属薄弱环节。主要体现在明前期与明后期研究较多,中期研究不足。而在地区民族研究上,又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明蒙关系、女真社会发展史等方面。在改革开放前,涉及明朝民族政策的内容的,仅有江应樑《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与土司》(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赖家度等著《明朝对瓦剌的战争》(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等部分成果。改革开放后,明史研究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有关论著论文大增,滕绍箴《努尔哈赤评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孙进己《女真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周远廉《清朝兴起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李鸿彬《清朝开国史略》(齐鲁书社,1997年版),李洵、薛虹《清代全史》第一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杨绍猷《俺答汗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杨绍猷、莫俊卿《明代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组编《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伊伟先《明代藏族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等著作,都有部分内容涉及明朝的民族政策问题。此外,尤值一提的是我的师姐奇文瑛同志在参著的《明代政治史》一书中,专写了《明代的民族政策》一章,^①按地区对明朝所实行的民族政策进行了分类叙述与分析,给人以不少启发。

^① 张显清、林金树等:《明代政治史》第八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有关明代民族政策研究的论文方面主要集中在明初阶段。先后有赵俪先《明朝的西域关系》（载《东岳论丛》，1980年第1期），蔡志纯《明朝前期对蒙古的民族政策》（载《西北史地》，1985年第3期），王复兴《论明成祖对蒙古的和平争取政策》（载《齐鲁学刊》，1985年第5期），范植清《论朱元璋治理南方各族的政策》（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王雄《明洪武时对蒙古人众的招抚与安置》（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彭清洲《明成祖民族政策述论》（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杨秀清《试论明朝对西北民族问题的决策》（载《民族研究》，1994年第6期）等。但成就最显著的当属吾师陈梧桐先生，他对明初的民族政策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并提出了较系统的看法，尤其是对明朝民族政策的开明性与局限性、明朝民族政策的运作机构等，都作了深入的分析。其主要成果除论著《洪武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增订本改名为《洪武大帝朱元璋传》，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朱元璋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有所反映外，还有《论朱元璋的民族政策》（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永乐至宣德的政策失误与“土木之变”》（载《光明日报》，1988年12月21日）、《论明王朝的民族观与民族政策》（载《明史研究》第4辑，黄山书社，1994年版）、《明朝民族事务管理机构述略》（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论朱元璋对蒙古的“威德兼施”政策》（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论朱元璋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德怀为主”政策》（载《江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明代宦官势力干预北部边防的严重后果》（载《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明太祖与明成祖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经营》（载《民大史学》第一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另外，

他的《明清松锦之战与洪承畴的功过评价》（载《洪承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明末清初社会矛盾的变化与洪承畴、郑成功、施琅的评价问题》（载《民大史学》第二辑，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论述的虽是人物，其中内容也涉及明末的民族政策问题。

1989年本人有幸成为陈梧桐先生的研究生，并在陈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开始涉足明史研究工作。他根据我本人是少数民族，且国内明代民族政策研究相对较为薄弱的情况，让我从事对明朝民族政策的研究。之后，我便以明中期的民族政策作为研究方向并最后在陈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硕士论文《明正统至天顺年间的民族政策》的写作。在答辩过程中，中央民族大学的王钟翰先生、胡绍华先生、邵献书先生以及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杨绍猷先生，都对本人的论文提出了宝贵而中肯的意见，使我收获良多，为我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指明了方向。硕士毕业后，我来到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从事教学工作，对明中期的民族政策继续进行了一些研究，先后发表了《明英宗时期的南方民族政策走向探析》（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论于谦的民族政策与边防思想》（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从明中后期的民族政策看葡萄牙殖民者窃占澳门得逞的原因》（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2期）、《论明代儒学中的民族观及其影响》（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嘉靖时期的政局变动对民族政策的影响》（载《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等论文，初步摸清了明朝中期民族政策的一些头绪。但是我总觉得这样研究下去，毕竟是零碎的、不系统的。因此，从2001年起，我即萌发了对整个明朝民族政策的演变问题进行研究的想法，以作为研究生学习阶段的总结。经与陈先生商量，得到他的热情鼓励与大力帮助，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多年来自己积累的资料以及所带学生撰写的相关论文资料全部